



□ 陈泽宪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

棋局如人生，得失两相宜。围棋作为一种变化无穷，妙无止境的竞技艺术，有益于爱好者启迪心智，陶冶性情，愉悦友谊。倘若成为一种职业，则难免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纹枰对决，残酷甚于潇洒

西政棋人逸事

结缘围棋纯属偶然

与围棋结缘，纯属偶然。读小学五年级时，县城举办一个校际运动会，其中有一个项目是围棋。我所在的小学当时没有一个会下围棋的学生，而校方却不愿这个参赛项目空缺。于是从会下象棋的学生中挑出几位，进行围棋速成训练。

三天之后，我就作为代表学校的棋手走上赛场，比赛结果可想而知，但从此我却与围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停课闹革命”的三年里，刚开始我参加一个“学红军长征队”，汇入了全国步行大串联的热潮。

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12岁少年来说，名为串联传播“革命火种”，实乃“自助3月游”罢了。但能有此良机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也算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如今每当我

看着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们还在享受父母的百般呵护之时，不免感叹当时我的父母怎么就放心让我走？好在当时虽然天下大乱，但却鲜有车匪路霸之类的剪径之徒。

“长征”路上，在比我的个头小不了多少的背包中，塞着一副塑料围棋。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这种引人入胜的竞技游戏，让我忘记了考虑它是否属于“四旧”之列。

每天入睡前，借着“红卫兵接待站”昏暗的灯光，与队友杀上两盘，一天步行几十公里的疲惫随之烟消云散，倒也快哉。

串联结束返家后，为躲避“武斗”战火，到外地投靠兄长，成了脱离“革命组织”的逍遥派。除了看些收罗到的闲书杂文之外，钓鱼、打猎和下棋几乎是我记忆中的那段少年生活的全部乐趣。

西政的围棋爱好者

未曾想，到西南政法学院上学后，学习之余反而有了些时间看看棋书，打打棋谱。因此到了后期，居然棋艺有所长进，以致可作为主力队员代表学校出战。当时同学中棋力与我相当的大约只有两位：阎民宪和叶双峰。

从名字看，阎民宪和我应属同年生人。1954年出生的人不计其数，但以同年诞生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命名的料必不多，后来能选择法律专业并且同一年到同一所大学求学的恐怕就更少了，而都是围棋爱好者，且棋力相当，则只能说是一种殊为难得之缘分。我与阎民宪平时下过多少盘棋已记不清了，但比赛棋只下过两盘。一盘是在班级对抗赛中下的。我与他作为各自班级代表队的第一台对阵，乱战中我侥幸取胜；另一盘棋则是在学生围棋赛中下的。实际上那是争夺冠军的关键一战，结果阎民宪抓住我的一着软手，上演了大逆转的活剧，报了一箭之仇。输了不该输的棋，令我刻骨铭心。以致许多年后，我居然还能复盘此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叶双峰是79级的同学，与我的老乡陈伯吉同班。小叶平时不苟言笑，下棋极具韧性，善长考，计算准确，少失着，常有出乎意料之妙手。我唯有全力以赴，方能略占上风。伯吉则棋力稍逊，但棋瘾甚大，毕业后在福

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我偶尔出差榕城，只要伯吉知道，必定拎着棋盒到我下榻的宾馆叫阵，然后昏天黑地杀上几局。通常是布局伊始，便狼烟四起，全盘乱战，尸横遍野，鲜有收官小胜之局。伯吉屡败屡战之顽强，常令我自叹弗如。

当时同学中围棋下得比较好的还有1班的彭士翔、4班的吴仲林、6班的李晓平等。仲林与我同班，是在西政才学的围棋，最后一年他看书打谱，棋艺突飞猛进，当时与其对弈，我已不敢掉以轻心。8班的赵可星、夏卫民在学校时似乎围棋刚入门，毕业若干年后刻苦钻研，居然也棋艺猛长，真是不可思议。

西政老师中的围棋爱好者，有两位值得一提。一位是高绍先老师，另一位是组织部的刘部长。

高老师为人随和，多才多艺，当过编辑教过书，曾任西政院长，后期专攻刑法史，著述颇丰。我毕业后还收到高老师寄来的两本著作。在校时，与高老师时有对弈。高老师棋如其人，张弛有度，绵里藏针，赢时赢得堂堂正正，输也输得中规中矩。毕业后若干年，高老师偶临京城，有时忙里偷闲，与我手谈几局，也是一份师生情谊。

刘部长当时似乎已经离退，赋闲在家。他棋艺平平，但棋瘾之大，在

西政无人可与匹敌。刘部长通常是在上午十点来钟或者下午四点来钟慢步踱至学生宿舍，笑容可掬，绝无半点部长架子，弈棋不挑对手，来者不拒。他下棋拍子有声，不假思索，棋速之快，足以让当今快枪手“曹燕子”（韩国棋手曹薰铉的绰号）之辈汗颜。什么胜负输赢，他全然不放在心上，享受的就是飞速拍子的“快乐围棋”。刘部长在棋局中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时间长了，对手往往觉得备受煎熬。同学们都怕被刘部长缠上，因为不战十局以上，决计不会让你脱身。即使到了饭点，饥肠辘辘，也休想逃脱，除非找来替身。这时他断然就是那句名言：“吃饭有啥意思，下棋多带劲！”以致后来只要有在楼道里叫一声：刘部长来了！霎时整个楼层悄然无声，个个房门紧闭，楼道空无一人。弄得刘部长上楼后在楼道里茫然四顾，疑惑自语：



▲ 作者与聂卫平（左）九段的合影

“今儿怎么都上课去啦？”

大家一直都觉纳闷，刘部长一把年纪，连续作战数小时，怎么就不饿？有一次趁着刘部长赢棋高兴之时，我终于套出他的个中秘诀：“我每次出门前，老伴总要给我煮四个荷包蛋。呵呵！”

域外下棋的经历

1987年8月，我作为中美法律教育交流委员会项目的访问学者，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研修。有一天，我在法学院走廊的信息发布栏上各式各样的信息中，发现了一份不显眼的围棋俱乐部的广告。我才欣喜地知道，这个因加利福尼亚大学总部所在地而闻名于世的小城，还有一个围棋俱乐部。

俱乐部在晚上和周末开放，看来

玩客主要是上班族。周末，我按图索骥找到了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师俱乐部二楼的这家围棋俱乐部。俱乐部的经理大约记得叫波尔。他对我这位新来者十分热情，询问了我的姓名和棋力。我因为不知深浅，就说大约初段水平。波尔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初段，咱们先来一盘吧！于是猜先开弈，结果我轻松取胜。再下一盘，再胜。他盯着我看了几

秒钟说：“你至少3段。”然后把我介绍给一个大胡子，“这是戴维6段，陈先生是3段，你俩下一盘吧。”

业余棋手对弈，一般相差一段可以让一子。按规矩，戴维要与我下一盘让三子棋。结果我大获全胜。改让二子棋再战，仍然没有给他机会。于是让先对弈，这回我感受到了他的强大力量，中盘投了。戴维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对波尔叫道：“你怎么说他才3段？！”我觉得波尔有些冤，因为戴维的棋力其实不到6段。

常来俱乐部下棋的棋手中，棋力较强的除了戴维，还有两三位来自韩国和台湾的先生。偶尔还见到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亦称6段，但棋力明显比戴维强。我与他下过一局授二子棋，几乎没有胜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当时美国围棋协会（AGA）的主席。

1988年7月，也是我即将回国的前一个月，美国围棋协会在伯克利举办“全美围棋大会冠军公开赛”。我报名参加了3段组的比赛。戴维还是很有自知之明，他没有在6段组报名，而是参加了4段组的比赛。结果他获得4段组冠军。我则以5胜1负的战绩，取得3段组第二名。一位来自纽约的华人青年战绩也是5胜1负，但可能小分较高，获得3段组冠军。

更有纪念意义的是伯克利这次比赛期间与中日职业棋手下的两盘指导棋。赛事主办者从中日韩请来了

一批高段职业棋手，为全美国棋大会增色不少。

第一盘是与一位日本九段下的授6子棋。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但肯定不是超一流棋手，因为我对他的名字很陌生。结果我中盘胜。这是我第一次向日本职业棋手学棋，也是第一次在授子棋中胜职业九段。后来在国内与职业九段还有过一次这样的记录，但那是一局授4子棋。

第二盘是与中国棋院的副院长王汝南八段下的，也是授6子棋，结果我输了。可见当时我的棋力最多也就是业余3段的水平。这是我第一次在电视围棋节目之外见到王汝南老师。他平易近人，棋局结束后还为我作了复盘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年后，在北京龙潭湖公园春节庙会的保留节目——中国围棋队的职业棋手与业余棋手下指导棋的赛场，我与王汝南老师重逢时，他显然已认不出我了。于是我提起伯克利的那次邂逅，不料他立即就说：“我记得，你是中国社科院的。”职业棋手的记忆力，确实令我惊讶不已。

棋局如人生，得失两相宜。围棋作为一种变化无穷，妙无止境的竞技艺术，有益于爱好者启迪心智，陶冶性情，愉悦友谊。倘若成为一种职业，则难免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纹枰对决，残酷甚于潇洒。这也是围棋职业棋手每每羡慕业余爱好者之处。

（摘自中国法学网）